

新德里的叢林意象： 《白老虎》中的都會生活空間

倪志昇 / Chih-sheng Ni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博士生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援引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概念，旨在探討印度裔作家亞拉文·亞迪嘉小說《白老虎》中的種姓與階級衝突，以及認同與空間政治。本文首先討論都會生活中空間性的建構，接著詮釋小說中的叢林意象，藉此說明印度社會的矛盾與衝突。本文探討主體如何於想像建構的社會體制中，透過挪用與實踐進而打破限制，重新建構身分認同與再現生活空間。

【關鍵詞】

種姓制度、資本主義、空間實踐、空間再現、再現空間、身分認同、都會生活、生活空間

【Abstract】

In *The White Tiger* (2008), Aravind Adiga describes a new urban life experienced by people in India, especially the Hindu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diga's depiction of New Delhi featu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of lifestyles in the society. His novel contextualizes urban life in a socio-spatial rel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social relations forms a distinctive spatiality that shapes a unique urban life in the society. Under Adiga's portrayal, New Delhi is presented to be clamorous and disorder; therefore, life in the city is full of confusion and is always in shifting.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ity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ife depicted by Adiga in the novel.

【Keywords】

the caste system, capitalism, soc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urban life, lived space.

前言

小說《白老虎》(*The White Tiger*)(2008)以二十世紀的印度做為故事背景，試圖描繪今日印度社會的諸多亂象。作者亞拉文·亞迪嘉(Aravind Adiga)以揶揄的敘事口吻，將印度社會比擬為大鳥籠，更將新德里喻為一座都市叢林。亞迪嘉以黑暗與光明為象徵，指出印度社會中的矛盾與弔詭，並且由此揭露社會變動中的種姓、階級、文化與道德等議題。小說以一個出身村落的低種姓賤民——巴蘭——做為故事主角，描寫他如何由鄉村步入城市，並由低賤的僕人搖身成為現代都會中的資本企業家。作者以微觀的角度，審視巴蘭於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衝突，與其追求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做的改變。然而，作者筆下的都會生活，明顯有別於傳統的印度社會。書中反映現代化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為印度社會所帶來的影響，而巴蘭的心路歷程不僅見證了社會結構的變異，他的認同轉變也展現了現代印度人的錯置經驗。亞迪嘉於小說中對於傳統與現代的觀察，除了關照兩者的對立面之外，亦同時關注兩者之間並存共生的互動關係。一如小說所呈現，現今印度社會的複雜性，雖根源於新與舊的對峙，但卻發展於共生併立的關係之中。新的社會結構不僅受到傳統的牽制，亦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揉合傳統而形成一個嶄新的面貌。

小說《白老虎》中，作者亞迪嘉以新興城市新德里和班加羅爾做為故事的主要場景。其中，又以德里的都會生活寫照，彰顯當今印度人民在現代與傳統兩相衝擊之下所呈現的身分擺盪與矛盾認同。不同於班加羅爾這座新興的城市，德里之所以耐人尋味，即在於城市中的新舊併立。雙城合一的現象在在說明現代都會於發展的同時，亦無法脫離蒂固的傳統與龐碩的歷史。追溯德里的近代建城歷史，十九世紀英國殖民時期開始，英人即多次計劃拓展舊城，使其更具規模。然而，英人於拓建「新德里」之時，並未將古城「舊德里」毀去。因此，德里在英人的發展之下，成為融合新舊兩域、現代與傳統並立的大城。以紅堡(Red Fort)為中心的舊德里，承繼當地傳統的文化形象與社會型態，和南方現代化、高樓林立的新興城市「新德里」形成對峙。然而，今日的印度首都新德里，雖為頗具規模的新興都會區，但是新與舊的區隔並非能夠簡單劃分，地理上亦將原本分屬兩域的新舊兩域歸劃合一，統稱「新德里」。合併的結果使得併列而立的新舊兩域，成為一個共生並存的大都會生活圈。小說《白老虎》中，作者筆下的人物，即是穿梭於新與舊之中，遊走在貧民窟與購物中心之間。在作者的筆下，德里隨即成為傳統與現代交揉調合的中界地帶。因此，作者將德里比喻為一座瘋狂的都市叢林(98)，以此凸顯新興都會中，傳統與現代的交流協調與轉變再造。作者藉由

都市叢林的意象，表徵城市生活中的矛盾衝突與失序混雜。以德里做為一個文化符碼轉換的交界地帶，書中所展現的城市生活與地景，打破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分區隔，表現其多樣而混雜的城市樣貌之時，亦不失新與舊的特殊性。

本文主要援引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之空間生產的觀念，檢視小說中所呈現的印度都會生活空間。並探索小說中生活空間的建構、階級衝突與身分認同等議題。本文首先檢視小說中主角的生活寫照，審視主角遊走在鄉村和城市的生活轉變與心路歷程，試圖論述主角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解釋主體如何在生活經驗(具體空間)中，建構自我主體並結構社會關係。第二部分以小說中都市叢林的意象為基調，分析城市中混雜失序的空間性，並探討主體在此其中所面臨的矛盾衝突，以及主體如何想像建構城市的生活空間。第三部分探討主體如何經由社會實踐不時跨界踰越、組織社會空間，並挪用與再造/現生活空間。最後，延續列氏的概念，第四部分推論作者的敘事手法，分析小說中的主角如何於都市生活中，重新建構自我身分認同、結構社會關係，並以此展現新認同與新社會。本文旨在探討亞迪嘉於小說中所呈現的都市叢林意象，藉此闡釋印度現代都會生活中矛盾與疏離的特質。

一、由鄉村到都市：日常生活中的空間性

作為一部印度都市文明的社會寫實小說，《白老虎》深刻的描繪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資生產力與經濟關係，及其為印度底層人民所帶來的問題。作者亞迪嘉所描述的生活轉變，亦即，巴蘭由鄉村到城市的生涯過程，一方面凸顯因資本經濟的影響而產生變化的社會結構與認同形塑；另一方面藉由人物位移與變動(displacement/shift)的心理刻劃，說明生活經驗與認同如何再造於空間的移轉及實踐的變異過程之中。小說以巴蘭的人生遭遇做為印度社會中底層人民的生命縮影，於故事的開始，即逐步道出賤民巴蘭由傳統印度農村轉向資本主義社會謀生的心路歷程。為了展現人物的心理轉變，亞迪嘉以人物時空位移的敘事手法，安排筆下主角巧妙地轉換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同時，作者透過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剖析印度社會關係中的變異，並以此比喻為傳統與現代兩相糾結的後果。小說中，作者對照巴蘭先後生活於鄉村和都市的經歷，以此揭示資本主義為傳統印度社會所帶來的衝擊。

亞迪嘉所描述的鄉村生活與都市生活，兩相比較之下，迥然不同。他以座落在印度迦耶區(the district of Gaya)中的一個傳統小鎮「拉斯滿加」

(Laxmangarh)¹做為書中主角巴蘭的家鄉，描述印度傳統社會的生活型態。如作者呈述，小鎮中的傳統市集裏，以販賣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如「米、食用油、煤油、餅乾、香菸和棕櫚糖」等為主（15）。而村民活動聚集的區域除了市集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即是供奉印度教神祇的寺廟，那是一座擁有「高聳如圓錐的白色尖塔」的寺廟，裏頭供奉著半人半猴的神像（15）。村中的每一戶人家，都過著樸實單調又貧窮的生活，對他們而言，「家庭中最重要成員就是那頭水牛」（17）。顯然，在作者的描繪之下，巴蘭的家鄉是一個典型的印度村落，社會關係的維持則以生活的基本需求為主。此外，鄉村居民知命的生活態度，也顯現了種姓制度的傳統價值觀，深深的烙印在人民的心中。種姓制度作為一種穩定社會秩序、維持社會關係的主要力量，將所有人的宿命規範其中，使之不得踰越²。故事中的主角巴蘭承襲父姓，一出生即命定為哈外(Halwais)³，正是種姓制度中的底層人民。因此，在種姓制度的規範之下，巴蘭深知他的種姓與宿命：「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就會立刻知道他的一切」（53）。命定的身分與認同的牽制，使初期生活於鄉村的巴蘭臣服於命運的安排，禁錮於層層種姓所堆砌的高台之下，無法脫身。

亞迪嘉所描述的鄉村生活形態，以及早期巴蘭知命屈服的態度，說明傳統印度社會體系中的主導意識即為種姓制度。換言之，種姓制度不僅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展現，同時也是一種建構個人乃至於社會、國族的意識形態與論述⁴。祥德

¹ 迦耶區 (the district of Gaya) 為印度北部的一個行政區。傳說中，佛陀頓悟的菩提樹便位於此區，因而被視為佛教的發源地。故事中，巴蘭的故鄉拉斯滿加 (Laxmangarh) 為此區中的一個小村莊，小說中第一章對於此地的生活形態有諸多的描述，尤其可參照9至21頁。

² 關於印度種姓制度 (caste system) 的探討，大致將印度社會體系分為四種不同的階級，即由最高等的婆羅門 (Brahmin)、次等的刹帝利 (Kshatriya)、第三等的吠舍 (Vaishya)、下等的首陀羅 (Sudra)，以及不在此四等社會階級以外的賤民 (outcaste) 所組成的種姓制度社會體系，以此體系劃分出許多不同的職業與社會地位。但因印度幅員遼闊，種姓制度因地域的不同或聚落的分布也有所差異，在此不再細述，讀者可參閱德孟 (Louis Dumont) 的著作《人類的階級：種姓制度的寓意》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1980)，該書中文書名為筆者暫譯。

³ Halwais 為印度種姓之一，屬於此制度中的下層階級。於印度傳統中，此種姓專司點心的製做，並以此為世代的行業，以服務上層階級為畢生的責任。

⁴ 關於意識形態的探討，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於〈意識形態與國家機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一文中認為，意識形態做為一種宰治社會結構的主要力量，不僅確保其統治體系的延續，還透過觀念意識的生產進而形塑受統治者的認同，使之各居其位。並且透過主體召喚

(Chand)明白的指出，印度種姓制度是一種「瓦爾那意識形態」(varna ideology)，其思想體系結合了印度教的教義，環繞「業力」(karma)與「法」(dharma)兩大思想。在印度哲學中，業力是組成因果關係的要素，說明人的前世作為決定了來生的命運；法則是人於此生的應盡義務，說明人必須經由修行來圓滿前世的業，並藉此得到更上乘的來生。祥德認為，在此因果循環的意識形態所建構的社會體制之中，人勢必成為該形態所建構的主體(subject)，「臣服於社會群體的制約之中，被賦予必須的技能、價值與態度，並以此展現生活行動的意義…」(1994:28)。基於此一信仰，印度人民的傳統生活價值觀，深繫於因果輪迴的業與法，人無法選擇出身高底或踰越已身的社會地位，只有欣然接受命運的安排，並努力圓滿今生早已命定的義務，才能成就更完滿的來生。由此，不難理解作者筆下生活於傳統農村的巴蘭的信仰價值，及其展現的生命意義。

然而，種姓制度所維持的社會體系，在亞迪嘉的筆下並非堅不可破。作者藉由描述巴蘭因時空位移而動搖的信仰價值，凸顯資本主義為印度社會結構所帶來的改變。如小說所述，典型的農村生活型態在都市化的發展之下，進入以追求財富為主的生產模式。因此，為了擺脫貧窮且謀求更好的生活，巴蘭由鄉村轉入都市，他離開拉斯滿加到丹巴德(Dhanbad)⁵謀生(43-4)。並且，為了在城市中謀得生存之技能，巴蘭決定在丹巴德學習開車。雖然學成後試圖進入富人宅邸工作的過程屢遭挫敗，他最終仍得以於哀求中得到僕人的工作，並於一次偶然的機緣下，擔任該地主次子阿薩克的司機，隨他移居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自此，巴蘭一擺過去村落的生活方式，於新德里展開新生活。對巴蘭而言，新德里是座炫麗的城市，眼到所見，皆是象徵國家首都光榮的高聳建築與寬廣平整的道路(98)。巴蘭成日駕車載送老闆往返，穿梭在新德里的華宅和大型購物中心之間，停留在辦公大樓與政府行政機構之前，他因而逐漸熟悉這座城市的面貌。雖然此時身為僕人的巴蘭，並非能完全依照自我意志選擇生活的方式，但是都市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卻讓巴蘭獲得全新的體驗、更寬廣的視野。開始融入都市生活之後，他更深信只有財富才能真正為生活帶來改變，他認為有錢就能買通一切是這座城

(interpellation of the subject)的方式，定位個人於社會中的論述位置，藉此結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屈服於體制的論述建構之中。進一步的探討，請參閱該文。

⁵ 丹巴德位於印度東北部，是迦克汗州(Jharkhand state)的行政中心，亦是印度主要的煤礦產區。小說將丹巴德形容為一座半調子的城市(half-baked city)，專為半調子的人所建造。用以諷刺丹巴德雖然看似為一座城市，卻尚未有城市應該具備的建設與體制(44)。

市的生存法則(103)。於是，巴蘭開始學習以金錢打交道，並利用腐敗的社會關係創造自己的成功，他寧用最卑劣的手法謀殺他的主人阿薩克，也不甘淪落貧窮。故事最後，巴蘭以竊得的金錢做為資產，學習都市富人累積財富的方式，經營自己的租車公司，以此打造一個屬於他的王國。

巴蘭由鄉村轉入都市的過程，不僅是個人的職涯過程，也是個人主體再建構的過程。鄉村至城市的轉換，一來指出社會結構的變異，一來則指出了結構變異下主體認同再造的可能性。小說中，亞迪嘉主要以傳統種姓制度與現代資本主義兩股勢力，作為建立社會關係與打造社會主體的主要推手，說明印度人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模式，除了深繫於傳統種姓制度之外，同時也受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影響。此外，作者描述兩股勢力彼此之間的消長，呈現變動中的主體認同，試圖闡述印度人身處於兩相矛盾、衝突不斷的社會體系中，主體認同轉變、再造的可能。在作者的描繪之下，故事中人物的心境轉換與認同建構，顯然深受整個社會體制與權力關係的消長所牽動，即使是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也可能因為新興力量的介入，而有所衝擊。小說中如此後設的觀點顯示，主體的形成在衝突不斷、矛盾不止的過程中並非一成不變。雖然主體建構是一種權力消長的過程與結果，但是，亞迪嘉所展現的社會主體，顯然具有流動性，其建構過程也並非毫無轉換再造的可能⁶。

如前文所述，時空移位——即轉換於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時空錯置與移位——是小說中角色成長與轉變的主因。若欲進一步探討作者敘事過程中的時空轉換，首先，則需對於小說人物所身處的時空構成要素加以分析，藉以檢視主體形塑的樣式。昂希·列斐伏爾在探討生命主體與社會關係之間複雜的建構過程時，提出了時間與空間，亦或歷史與地理，做為建構主體與結構社會關係的基礎，兩者缺一不可。於其著作《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中，列氏認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1991:26)。並指出，若將空間視為一種可生產的社會產物，空間的生產過程與形式的再現，即是一歷史的進程與其形式的再現(1991:46)。列斐伏爾試圖用空間概念中所含括的歷史性、社會性、

⁶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多部著作中深耕權力關係、社會結構，以及主體建構的觀念。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書中，提出「規訓身體」(*docile body*)的觀念，說明身體如何在權力或知識體系的建構之下，成為種種論述所建構而成的主體。此外，傅柯更於《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一書中指出，論述的建構實屬一個持續進行且多元的過程。傅柯將權力關係的發展視為一種流動且非固定的形式。以此說明了權力關係中的主體建構，是一種非穩定的歷史過程，其中充滿流動性與變異性。

以及空間性三者相互建構的關係，解釋現代都市中社會結構與空間生產之間的關係。他將空間呈現為主體活動、行為和經驗的媒介，亦同時將其視為結果；換言之，空間的生產同時以空間為其生產的前提，其生產的結果亦反之形構空間。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思維，列氏所關照的生產模式，由空間中物的生產，轉移到空間本身的生產，並且強調空間的歷史性與社會性。列氏的空間概念，除了指向具體的自然空間之外，更意謂著社會結構中生產模式所展現的抽象空間。此概念說明空間如何在社會關係的建構之下，於其生產模式中進行改造，並使具體空間在抽象空間的形塑過程中體現不同的意義，兩者之間彼此影響且交互建構。

為了解釋行為主體和社會結構兩者與空間建構的交互作用，列氏在《空間的生產》中，將空間的概念分成三種形式：「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及「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spaces of representation)(1991:33,38-39)。其中，「空間實踐」的概念，說明了人類的社會活動，建立於特定地方的生產關係之中，因而維持並延續社會結構中的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並在其物質生產的過程中，形成社會空間。「空間再現」體現了空間中的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是一個「概念化的空間」(1991:39)，並經由知識系統中的符碼建構，主導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1991:38-42)。然而，「再現空間」則是具現複雜體系的空間符碼，這個充滿想像的空間與具體空間重疊，透過空間之中的象徵客體，再現生活所經驗的空間，在此之中，生命主體經驗了一切象徵客體，並經由想像加以改變挪用(1991:39)。因此，對列氏而言，再現空間是一個「流動且具有活力」的空間(1991:42)。列氏的空間「三元概念」(triple concepts)不僅解釋空間生產的社會性，更深刻揭示了主體於社會空間中，所經驗的三個重要時刻(three moments)：「感知的空間」(the perceived)、「構想的空間」(the conceived)以及「生活的空間」(the lived)(1991:46)。而此三個相互建構而成的空間形式，將行為主體深繫於實體空間、想像空間、社會空間三個互動的層面。

對列氏而言，現代都會中所呈現的空間性，將生活的空間(再現空間)建構在社會關係(抽象空間)所具現的城市空間(具體空間)之中。對於空間性的探討，同時將具體的空間、抽象的社會關係、主體的生成，以及主體對空間的建構，一併納入討論。藉此了解生活空間如何具體化生產與再生產、支配與屈服、挪用與再造、真實與想像的社會關係。若以列氏的觀念做為分析的基礎，小說中看似單純，由鄉村到都市的生活經驗，則展現了印度人於新興的都會生活中，自我認同與社會關係的建構過程。聚焦於德里這座混雜傳統與現代的大都會，亞迪嘉的描述不僅呈現當今印度的社會脈動，並展示出德里特殊的空間屬性。

二、失序的都市叢林

小說中，亞迪嘉將德里形容為一座「瘋狂的城市」(98)，有意以德里的失序與混亂，凸顯存在於城市中的矛盾與衝突。對亞迪嘉而言，生活在德里這座融合了新都與舊城的大都會之中，猶如生活在「叢林」裏，一切都在混亂與脫序之中重整(98)。遠溯德里的建城歷史，自古以來，德里即為諸多邦國的主要領地，多次作為首要之城，在歷經多朝印度邦國的建設之下，逐漸成為政治與經濟往來的中心。十七世紀初葉，強盛的蒙兀兒(Mughal)王朝⁷亦選在這個位於亞穆納河畔⁸的古城建造皇都。特別的是，德里的城市文明從該時期開始，即結合了伊斯蘭教與傳統的種姓制度，宗教信仰與種姓制度逐漸融合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城市的繁榮於十七世紀沙賈汗(Shah Jahan)⁹國王統治期間達至頂盛、繁榮空前。十八、九世紀之時，德里在英國人的殖民之下，因受工業革命的影響，開始發展出現代都市的雛形，逐步進入現代化。1911 年，德里成為印度的首都，城市的發展由此走入下一個重要的階段。當時，為了容納與日俱增的人口並發揮城市的功能，英國人有了更具規模的都市計劃。他們於德里舊城往南二十餘里推進，拓展新土、建造新都，並將新市區命名為新德里。1947 年，印度獨立後，印人將兩域歸畫合一，當今的新德里包括了以紅堡為中心的舊城，以及南方的新都，形成新舊兩域並列對立的城市樣貌。

亞迪嘉所描述的德里，顛覆了世人對於現代城市的秩序與規劃的想像。在他的筆下，新與舊的劃分顯得模糊不清，都市叢林意象所展現的城市，表達了新舊交融之下的混亂與失序。對亞迪嘉而言，無論是舊德里或是新德里都如同叢林一般，顯得十分混雜、脫序與擁擠。因此，在失序的都市叢林中生活，混淆、迷失、衝突皆無可避免。如小說呈述，雖然城市中的每一條道路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是卻從來沒有人可以辨識出正確的方向，也沒有人能夠清楚知道自身所處的位置上道路的名稱究竟為何：

⁷ William Dalrymple 於 (*The Last Mughal*) 一書中，詳盡的探討蒙兀兒王朝於德里的興衰過程，書中對於德里於歷史建構過程中的城市演進亦有相當深入的討論。

⁸ 亞穆納河 (Yamuna River) 流經德里東方，舊德里即是沿著該河建城。

⁹ 沙賈汗 (Shah Jahan) (1592-1666) 為印度蒙兀兒王朝(Mughal Empire)第五位國王。在位期間以舊德里為皇都，多有建設，被視為蒙兀兒王朝建築的全盛期。舊德里境內著名的建築如紅堡 (Red Fort)、泰姬瑪哈陵 (Taj Mahal) 與迦瑪清真寺 (Jama Masjid) 等，皆於沙賈汗在位其間完成。舊德里也以沙賈汗為名，稱為Shahjahanabad。

所有的道路看起來都一樣，這些路全都繞著長滿草的圓環而行，圓環中有人或是睡覺，或是玩牌。接著四條路從圓環放射而出，你由其中一條路往下走，又會碰到另一個裏面有人在睡覺或者玩牌的圓環，一樣長滿著草，一樣有四條道路從圓環放射而出。所以，在德里你只會一直迷路，不停的迷路。（亞迪嘉 2008:99）

顯然，德里的空間規劃容易讓人產生混淆，寬廣的道路與圓環讓人難以辨識、無所適從，平整的大道卻成為迷失方向的指標。城市中看似經過規劃排列的編碼系統，卻是造成生活中錯置經驗的主要原因：「在聚居區中，有一棟房子名為 A231，下一棟房子卻是 F378」（98）。如小說呈現，在迷失的城市之中，無法以正常邏輯做為生活經驗中判斷的依據，因為，在失序的城市裏早已沒有邏輯。失去秩序的城市則顯得更加的混亂擁擠，不僅舊德里「到處擠滿了人力車」（23），於新德里「車子、機車、摩托車、電動三輪車、黑色計程車在馬路上爭奪空間」，人潮洶湧、十分擁塞混雜(112)。就亞迪嘉而言，德里是一座龐大、失序的都市叢林，在實際的生活經驗中毫無邏輯、秩序可言。

小說中，都市叢林的寓意，在於探究現代都市生活中的錯置經驗與衝突。就亞迪嘉所呈現的德里而言，叢林寓意的複雜性並非在於新舊兩域的對立；而是兩域所表徵的社會關係，及其彼此影響所造成的結果。顯然，亞迪嘉並非意欲展現城市的二元區隔與對立。雖然他的描述時而以舊德里代表印度種姓制度的傳統社會結構，以新德里表徵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所維持的社會關係，但是，亞迪嘉更以都市叢林的意象，試圖指出城市中這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之間的交流互動。亞迪嘉的叢林意象，一方面說明印度社會的兩種體系並非壁壘分明、亦非各自獨立於新都與舊城；另一方面亦指出社會建構的流動性與不穩定性，叢林意象所展現的混雜、失序與衝突，暗示著兩股勢力交媾併立的結果。對亞迪嘉而言，德里在現代都市化的建設發展之下，整個社會結構因深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而有所變化，即使是根深蒂固的傳統亦無法倖免。如此改變，可於作者所描述的舊德里街景中窺探究竟：「腳踏車上是瘦骨如材的男子，身體傾前奮力的踩著踏板，載送後廂中肥胖的中產階級——胖男人帶著胖老婆，以及他們的購物袋和食物」（23）。小說中，人力車將舊德里擠得水洩不通的景象，明顯與傳統悖離，顯得十分弔詭。舊德里的賤民車伕後廂所載的並不是高種姓階級的人民，反而是有錢的中產階級。亞迪嘉以此描述兩種社會體制在現代都會結合的景象，指出象徵資本主義的中產階級，於現代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打破了舊有的局限，顛覆了傳統的

框架。

在亞迪嘉的敘事中，光明與黑暗是貫穿小說的兩個主要的象徵。他以巴蘭的出生背景象徵黑暗，直指貧窮與落後；以新興城市高度發展的富裕榮景象徵光明。亞迪嘉所表徵的社會關係雖然有光明與黑暗之分，但他其實打破了光明與黑暗的二分法，展現傳統與現代兩種體制於新興都會中結合而成的新興現象。現代都市在資本主義興起的結果之下，結構上的種姓階級與社會(資本)階級交錯併疊，在兩種不同力量的宰治下，德里的社會結構形成所謂的「雙重體制」(twofold system)¹⁰：種姓階級與社會階級併疊成為組織社會關係、建構社會空間的主要力量。小說中，亞迪嘉所呈現的空間規劃，巧妙的呈現了雙重體制的社會性建構，除了城市中的新舊區別之外，亦具體展現在巴蘭與其主人阿薩克所居住的空間結構上。他以建築物內的空間劃分，表徵兩種體制裏上與下、尊與卑的區隔。亞迪嘉對於這棟位於新德里的建築有著極具象徵性的描述：

在印度的每一棟公寓大樓、每一間房屋、每一個飯店都有蓋僕人的宿舍，有時在後面，有時則在地下室。擁擠雜亂的房間相互連結，大樓中所有的司機、廚師、清潔工、女僕以及大廚都在此處休息、睡覺與等候。當我們主人需要我們的時候，電鈴響徹整個宿舍，我們就會跑到板子前面，看是公寓中那一戶的紅燈在閃，表示樓上需要哪個傭人。(亞迪嘉 2008:108-109)

顯然，有別於居住在大廈上層擁有「豪華大廳」的主人們，居住在下層的僕人們猶如住在集中營一般。他們的居室簡陋，房間內「地板還沒做好」，僅有一張「破爛的小床」，「牆上四處都是蟑螂」(109-110)。由此可見，巴蘭與主人阿薩克於德里的住所，內部的空間配置表徵了整個社會體制建構的結果，由大廈內空間的配置即可得知主僕的階級區隔。如一印度社會學者菲利普斯(W. S. K. Phillips)所

¹⁰ 雙重體制(twofold system)為印度社會學家菲利普斯(W. S. K. Phillips)於“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Urba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ia”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菲利普斯認為，當今印度的社會結構在現代都市化的發展中，結合了傳統種姓制度與現代資本主義下的社會階級。這種新興的社會結構使得種姓的「階層」與社會的「階級」兩相結合。就菲利普斯的觀點來看，大部分原屬低種姓的庶民在新的體制裏亦屬於社會底層，原屬較高種姓的貴族在新的社會結構中，仍然佔據社會上層階級。此外，菲利普斯認為在新的社會結構中，社會底層人民有機會透過教育或是資產的累積運作而晉身為社會上層階級。但是，在此過程中，因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階級變動則衍生出許多層面的衝突問題。請參閱該論文於*Urbanization in India*，83至99頁。

觀察，傳統的種姓制度在現代化的影響之下，與新興的社會階級結合。揉合的結果就是，上層種姓或傳統貴族大多成為當今社會上的權貴，而原屬下層種姓的奴役階級則難逃其宿命，於社會上亦較為弱勢、貧窮。亞迪嘉筆下的巴蘭即代表著此種社會結構下的弱勢，在揹負著傳統賤名的同時，亦生活於現代社會階級的底層。這棟外表華麗的公寓大樓就像是德里的縮小版，生活在上層公寓的人屬於社會上的中上階級，而被迫居住在建築底下的人則是社會上的底層人民。

正如亞迪嘉所述，德里雖然是一座含蓋新舊兩域的現代都市，却猶如兩個同時併存而立的異世界。對他而言，「德里不是一個國家的首都，而是兩個國家的首都，兩個印度。光明與黑暗共存於德里」(215)。光明與黑暗兩相糾結，看似分離卻又同時並存，兩種社會型態於德里各自展現不同程度的分與合。因此，在雙重體制的形塑之下，光明與黑暗時而分立、時而重疊、時而混淆，以失序混雜的狀態，具體展現於德里的城市生活空間之中。然而，亞迪嘉所再現的生活空間，看似衝突却又可調和的雙重性與異質性，解釋了列斐伏爾所提出的「矛盾空間」(contradictory space)與「差異空間」(differential space)兩個空間的概念。列氏認為，社會空間的生產及運作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到異質轉換與矛盾對立的過程。在此其中，遵循毫無固定邏輯之社會實踐的主體，不時在空間實踐中透過心靈空間的意識轉換，試圖建構自我於調合的社會空間之中。亞迪嘉筆下的巴蘭，即是在社會空間轉換的矛盾對立中，追尋自我認同的價值，在都會空間的雙重性與異質性交互建構之下，巴蘭成為一個有別於新舊、蛻變於異質空間中的社會主體。小說中的叢林意象，除了展現德里都市生活空間的混雜與變異之外，也同時寓意著城市生活中的困頓、掙扎以及殘酷。光明與黑暗的衝突，則更說明了底層人民於此社會結構的運作當中，為了逃離黑暗掙脫貧窮所面臨的殘酷爭奪。如同生活在叢林之中，若欲求生存就必須遵照叢林法則，不是吃掉他人就是等著被吃掉，別無選擇 (54)。城市空間的失序混淆與變異暗示著此種你爭我奪的結果。

三、空間的虛與實：劃/跨界與挪用再造/現

列斐伏爾於〈空間與生產模式〉(“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一文中以城市與鄉村的空間分割、空間差異，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擴張所產生的問題，並於該文中以三種形式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空間關係，這三種形式分別為：「同質性」(Homogeneity)、「斷裂性」(Fragmentation)以及「階級性」(Hierarchization)。列氏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主導城市的發展，將城市的實體空間與社會空間導向同質化，城市的建築，舉凡道路、商場、

機場等一切所有的建設或建築物，都有其功能性，而城市的空間則被包覆在其社會生產結構的關係鏈之中。再者，爲了區別空間的功能性，城市空間將會受到知識體系的分割而形成斷裂，具現運作於城市空間中的社會關係：「空間被切割爲許多不同的空間，各自展現有別於其它空間的功能性：勞動、住宅、消遣、運輸以及交通、生產、消費」(2009:214)。最後，列氏認爲這些受到劃分，並展現各自功能的社會空間將被階級化，形成中心與邊緣的區隔與對立。列氏將中心解釋爲「權力、財富、物質或非物質的交易、休憩以及資訊等中心」；反之，遠離中心或不及中心之處，則將其視爲邊緣 (2009:215)。就列氏的觀點而言，城市中的空間劃分，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所建構而成的空間區隔，在此同時，亦將社會空間轉換爲權力施展的場域。因此，借用列氏的觀念探討亞迪嘉的小說時可察覺，德里的城市地景，在受到雙重體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塑之下，城市空間被分割爲許多具有不同功能屬性的區塊，其中則顯現出權力關係運作下的區隔、矛盾、衝突與交流互動。

小說中，整個德里的生活空間在雙重體制的規化以及想像建構之下，雖然有光明和黑暗的區分，但却也不時存在著重疊與跨界。亞迪嘉以空間的劃/跨界，展現德里這座都會叢林中的權力關係、階級對立，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地景分割。小說中，作者將德里的大型購物中心等公共娛樂商場，建構爲中產階級的空間，是光明世界的表徵。因此，屬於黑暗區的底層人民，在空間實踐的制約下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如小說描述，類似巴蘭的底層人民，非但不被允許跨入購物中心或飯店之類的公共空間，更受到嚴格的規定，他們只被准許待在規範的區域之內：「五星級飯店對於司機停留的地點有嚴格的規定，當主人們在飯店裏面時，司機應該把車停特定的地點」(170)。如同巴蘭一般，等待主人用餐或購物的司機們，在規約的停車場內聚集，「圍成一圈蹲著閒聊，像一群猴子一樣」(170)。當他們試圖接近這些屬於光明的空間時，門口的警衛便會阻止他們：「只要警衛看到一個司機靠近飯店，他就會開始怒視你，他會向學校老師一樣對著你搖晃手指」(170)。除了黑暗世界的底層人民之外，隸屬光明的中產階級同樣遵循社會規約，避免進入黑暗的境地。如亞迪嘉所描述，在新德里的底層人民，集居在購物中心後方的貧民窟，居住在此地的人都來自黑暗區，這些建築工人在戶外排便，糞便就像是貧民窟的一道防護牆，「任何有尊嚴的人都不會越過那條線」(222)。這些集居、分散於新德里大小建地中的貧民窟，即隔著這道無形的牆與光明的世界對立。在亞迪嘉的描述之下，光明與黑暗之間彷彿有一道無形的疆界，在社會關係的維持下彼此保持距離。

然而，這些受到分割界定、看似孤立的區域，卻是具有穿透性以及流動性。小說中，巴蘭的司機身份，即象徵性的展現了流動的可能。身為司機，巴蘭駕車遊歷於城市的各個角落，其中包括了象徵光明的購物中心，或被視為黑暗的貧民窟，司機的身份使他置身於兩界之中。小說中，有一幕特別描述巴蘭跨界越入購物商場的情境，即展現了巴蘭身處兩界的可能。為了順利進入購物中心一窺光明的世界，巴蘭特地換上主人阿薩克的新 T 恤及黑皮鞋，雖然未被阻擋順利進入了商場，巴蘭卻高度緊繃，他「一看到警衛就立刻轉身」，深怕因身分洩露而遭到逮捕，深怕會被叫回去甩耳光羞辱 (128)。在這個光明的商場內，巴蘭緊張地認為所有人都正在盯著他看，因此，逛完一圈之後，他又走回停車場內，進入他平日所駕的車子裏，並且換回他平時所穿的花襯衫。顯然，巴蘭跨界的行動暗示著光明與黑暗之間流動的可能，由此可見，想像建構的實踐過程如何巧妙地轉化存在於空間之中，經由實踐空間中的規約，透過身體的扮演進入不同的想像建構¹¹。此外，巴蘭緊張的情緒，也顯示了越界行為所可能引發的緊張與對立；對峙的氛圍同時也暗示著想像建構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衝突。參照列氏的說法，人類活動、行為與經驗非但建構於心靈空間所再現的空間想像之中，亦緊緊於整個社會關係與權力運作的想像建構。因此，小說所呈現的都會生活經驗中的矛盾與錯置，使得生活經驗的建構在受到權力與意識形態規約的同時，亦透過感知與想像創造自我的生活空間，並以此解讀空間實踐的方法。小說中，巴蘭遊走於不同空間，實踐不同空間規約之時，也展現了自我生活空間的感知與想像。

除了展現流動性之外，在亞迪嘉的描述裏，光明與黑暗所展現的城市樣貌，也強調了兩者併立重疊的混雜性。看似對立的明與暗，在德里這座新舊併立的都市中交流互動，社會結構自然獨具一格。就書中呈現，造成兩方重疊跨界的主因顯然在於大量的人口流動與遷移。小說中，巴蘭入城的經驗，反映了成千上萬的印度底層人民，為求生計而大量湧入城市之中謀生¹²，這些被稱為來自黑暗區的

¹¹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於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一書中，提出身體展演 (performativity) 的概念，說明主體有意識的透過自身身體的扮演，展現社會體制規範下所賦予的身份位置。並藉此觀念說明，身體不斷操演實踐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表意作用，可能顛覆實踐的原本意義。筆者於此藉由巴特勒身體扮演的概念，說明於社會建構下的身份位置，可能透過有意識的實踐展演，而顛覆原先存在的意義。

¹² 關於底層人民大量由鄉村湧入城市的探討，Biswajit Banerjee 於 *Urban Migration and the Urban Labour Market: A Case Study of Delhi* 一書中有深入且多面性的探討，書中以德里為例子，檢視德

底層人民，四處流竄在這座試圖建立秩序的光明城市之中。可想而知，這些象徵黑暗勢力、猶如難民般的底層人民，湧進都市的結果即是光明與黑暗的重疊與衝突。如小說描述，整座城市的公共空間被大批來自黑暗區的人民所占據：

成千上萬的人住在德里的馬路旁，他們也來自黑暗區，你可以由他們瘦骨如材的身體和骯髒的臉孔分辨出來。他們像動物一樣住在大橋下或高架橋下，車子從馬路旁呼嘯而過，他們在那邊生火、盥洗、抓出頭髮裏的蟲子。
(亞迪嘉 2008:99)

這些來自黑暗區、又瘦又髒的底層貧民在德里市區內，打開鋪蓋就地而眠，使得整潔的街道變得髒亂，原先的秩序消逝不在。這些公共的場域，在大批貧民的佔據之下早已失去了當初規畫的意義，顯得混雜。在此同時，也因為場域使用者的改變，空間的想像與實踐也產生變異。如小說描述，大廈周圍的人行道現在變成窮人的居所，如果有錢人想散步，就得待在自己大廈的水泥廣場上 (191)。由此可見，居住在市區中的富人們於面臨窮人壓境之時，選擇改變生活習慣。在亞迪嘉的筆下，這些身處邊緣位置的底層人民，雖然看似生存於城市的狹縫之中，卻以頗具威脅的態勢，影響城市中心的空間實踐。縱然身處城市空間的邊緣，但是他們為整個城市的空間實踐與社會關係所帶來的改變，卻不容小覷。小說中，亞迪嘉對於邊緣的描述，也展現了一種以邊緣反觀城市中心的視野。

在亞迪嘉的描述之下，湧入城市的底層人民也必須歸順於城市中的社會體制，成為都市生活形態下社會關係的一環。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對於同質規化的訴求；相反地，由於受到都會生活中的化約，不同的階層在社會上對於空間實踐的解讀也有所不同。以列氏的觀點來說，生活的空間是一個真實與想像結合的空間，雖然受到社會力量的規化，卻也是一個徹底開放的空間，在想像建構之下再現權力關係，展現對抗主導秩序的力量。列氏對於生活的空間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認為在真實與想像的互動之下，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可能在不同的解讀過程中重組再造。反觀小說所述，雖然底層人民進入了一個制約的社會空間，但是卻在解讀社會實踐的過程有所差異，而這個變異的結果，即是對社會實踐的重新解讀，對社會空間的挪用與再造/現。小說中的底層人民於進入城市之後，同時融入資本主義下的現代都會生活形態，並藉由挪用空間實踐的方法，建構出屬於

里與周遭鄉村的經濟互依關係，並對來自鄉村的底層人民於德里都市經濟結構所產生的變化有所觀察。

自身的場域。如亞迪嘉所述，德里的每個大型市場中都有兩個市場，「總是有一個較小的、較髒的大市場翻版，擠在某一條小巷子裏」(173)。除了市場之外，舉凡電影院、購物中心或書攤，都有兩種版本，一個是富人聚集的地方，另一個則是窮人的去處。亞迪嘉於小說中透過解釋光明與黑暗即分立又重疊的特性，呈現一個社會上的兩種空間實踐與想像。

小說中，即分立又重疊的光明與黑暗所表徵的城市地景，充滿了諸多發展的可能性，是一個充滿想像的第三空間。如前文所述，空間的劃分、斷裂與重疊，使得空間實踐得以被挪用甚至再造/現，在不時流動的想像建構之下，結構出有別以往的社會關係，成爲一個充滿想像的開放空間。發展自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組概念，索雅（Edward W. Soja）於其著作《第三空間》（*Thirdspace*）中，提出「第三空間」（Thirdspace）的概念，試圖以此概念說明主體如何在實體空間中，經由社會空間的實踐與心靈空間的想像建構，創造第三空間的可能。索雅對照列氏空間概念的三種形式，認爲主體的生活空間是由真實以及想像兩個空間相互建構而成¹³。索雅尤其著重於第三空間中發展諸多可能的開放性，同時他也將第三空間視爲一種充滿批判性的空間。亞迪嘉於小說中對於黑暗占據光明的描述，同時展現了高度的開放性與批判性，因爲，在他的筆下，這些處於都市空間規劃中的邊緣地區，如貧民窟、天橋下、馬路邊以及舊市場，成爲挪用空間實踐的最佳平臺，是一個極度開放的空間。他所描述的邊緣人物，以巴蘭爲代表，歷經諸多的矛盾與衝突，在不同空間實踐的打造之下，顛覆了既定的身分地位，轉入權力中心。此外，作者對於巴蘭遊走城市中心與邊緣的描述，亦提供了一個新的城市觀看視野，巴蘭同時身處兩域，時而由邊緣觀看中心，時而由中心反觀邊緣，在他的想像建構之下，結合兩者並發展出自我觀看城市的眼界。因此，亞迪嘉的刻劃打破了中心與邊緣的劃分，城市中的邊緣地帶成爲反制權力中心的場域，身處邊緣的社會底層，在想像建構的過程中，得以由既定的位置跳脫。

¹³ 索雅於《第三空間》一書中，發展列氏的三元組概念，以「第一空間認識論」（Firstspace epistemologies）、「第二空間認識論」（Secondspace epistemologies）、「第三空間認識論」（Thirdspace epistemologies）解釋空間性的發展，藉此解釋人類生活中的空間性包含了物質、心靈與社會，同時是真實與想像，也是具體和抽象。其中，又以「第三空間認識論」融合了歷史性、社會性以及空間性的人類生活場域建構，囊括第一、二兩種面向，並打破二元性，試圖發展出有諸多可能性的第三空間。讀者可參閱該書第二章。

四、都會生活中的認同形塑

在亞迪嘉的筆下，都會生活中的認同顯得擺盪不定，在不斷遭遇衝突的空間中持續重組。他以叢林的意象作為德里都會生活空間的隱喻，以此展現德里的失序與混雜，並將故事的主角巴蘭比喻為通行於大都會中謀生的白老虎，藉此嘲諷當今社會上自命不凡的大企業家。作者以白老虎比擬巴蘭自有其獨到之處，白老虎出沒於印度山間，因先天基因的缺陷而成為有別於一般膚色的老虎，白皙的外觀特別引人注目，常被人們視為一種非凡的生物。巴蘭就如白老虎一般，來自印度偏遠地區，其平窮與低賤種姓的身分地位，是他先天宿命的不足。但是，巴蘭卻自許為白老虎，他深信自己不會受侷於先天的命定而一生埋沒；反之，他自我期望能與白老虎的生命際遇一般，成為眾所注目、出類拔萃的非凡生物。然而，在亞迪嘉的安排之下，白老虎的象徵意義不僅充滿矛盾衝突，所表徵的生命價值亦顯得相當扭曲。如小說所述，巴蘭自我認同的矛盾與衝突，係因他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塑之時，無法滿足自我生活與建立自我認同。因此，在他歷經城市生活的改造之下，他逐漸融入都市叢林的法則，深信只有「身體力行，力求改變的人」才能擺脫黑暗，迎向光明(3)。但是，為了達到目的，巴蘭摒棄了道德的規範，精心策劃謀殺主人阿薩克的計畫，並於事成之後奪取阿薩克的錢財，輾轉逃離德里。他利用這筆財富經營租車公司，成功的運用金錢買通警察，使經營更加順利。至此，巴蘭認為他不再是沒有真正名字的人，而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企業家，深信自己已從黑暗走向光明。以此，作者審視世人定義光明與黑暗的價值，藉由巴蘭的轉變反諷世人扭曲的生命價值觀，不僅揭示了現代都會中的腐敗體制，亦嘲諷都市叢林中遵循敗壞的叢林法則，欲望一躍而上成為白老虎的現代資本企業家。

亞迪嘉以書信體的敘事手法作為小說的主要結構，描述巴蘭在七個夜裡獨自於書房寫信給即將到訪印度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巴蘭的書信中，他逐步講述他個人所遭遇的人生經歷，詳細的道出他如何由出生低賤的貧民，晉身成為當今社會上坐擁華宅的大企業家。亞迪嘉的安排，不禁讓人聯想作者除了嘲諷當今印度社會發展中的亂象之外，也以此對照印度及中國兩個當今正值經濟起飛、高度發展的社會，並以巴蘭的人生際遇警示中國這個大經濟體，藉此暗諷溫家寶的到訪實無必要。小說中更指出，他的到訪不應僅將目光投注於印度經濟發展下的榮景表象，更重要的是能夠關注到社會發展下所衍生的黑暗面，以及常遭忽略、卻又日益淪喪的道德價值和生命意義。然而，除此寓意之外，亞迪嘉的敘事結構以及陳述的內容，都能充分表達出都會生活經驗與認同形塑的不完整性與反覆性。結

構上，書信體的講述方式即是一種拼貼的過程，作者以數封書信逐步拼貼主角巴蘭的人生際遇，故事的鋪陳並未遵循固定的邏輯軌道，使得講述的結構時有斷裂，顯的反覆。再者，巴蘭亦透過講述自己人生的經驗，在數封書信的反覆追溯人生記憶的同時，逐漸拼貼過往並建立自我的主體性。但是，由於追憶的過程不時斷裂，追憶的內容也因而顯得片段，時有反覆、甚至重疊。就巴蘭而言，在都會生活中的自我認同形塑，是一個不斷經由重組、拼貼、想像建構的過程。

如小說呈現，德里的都會生活經驗，是經由對於城市空間的想像建構而成。小說中所呈現的都會生活，在作者與書中人物的想像建構之下，呈現出一種破碎分離的空間與狀態。一如前文所述，德里的生活空間是混雜失序的，無論是實質空間亦或心靈空間皆為如此，同時建構在雙重體制的社會空間之中。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拼貼過程¹⁴，使得行為主體無法完整掌握整個生活的動向，如亞迪嘉所述，生活在德里這個混雜的城市空間之中，很難清楚掌握整個城市的面貌，對於城市地圖的認知，亦顯得支離破碎(118)。因此，生活其中的人們，對於城市的想像建構亦顯得片段、甚至重疊。然而，這些局部片段的想像，却不時經由拼貼、重組，逐漸形成對於一座城市的認知。小說中，雖然巴蘭對於城市空間的認知是破碎的、在混亂空間中的定位是模糊的、對於所到之處的想像也是局部片段的，但是巴蘭卻透過駕車遊歷整座城市，而逐步建構德里的生活想像。於是乎，對於巴蘭而言，只有透過反覆的遊歷於城市的大小街道之中，才能試圖掌握整座城市的面容。因此，巴蘭反覆遊歷城市的過程，即是重組城市生活中破碎的經驗，以及對於城市想像的建構旅程。在亞迪嘉的筆下，德里的都會生活即是在此猶如碎片的經驗之中堆砌而成。

亞迪嘉所呈現之反覆建構的生活經驗，指出了現代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日常生活特質。列斐伏爾亦於其著作中，對於資本主義下的現代空間實踐，提出他的看法，認為現代生活因受資本主義影響而趨向同質性，具有單調與反覆兩種特質。

¹⁴ 為解釋生活經驗與社會結構兩者相互牽連的曖昧關係，昂希·列斐伏爾於長達三冊的《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1991, 2002, 2005）中，詳細檢視日常生活如何於現代性的建構之下進入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關係之中，並強調將日常生活作為研究面向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列斐伏爾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解釋為「每日生活行為之集合」，亦即人們每日所進行的活動之總稱，可將其視為發生於個人的、群體的、亦或是社會的行為活動（2005:2-3）。然而，這些看似獨立的活動，卻相互連結而形成完整的整體，構成生活之經驗。因此，人們的日常行為牽涉了整個社會關係的運作，也與社會組織的運行模式息息相關。

他將現代日常生活的異質變化，歸因於日常生活中的重複性（2005:11-2）。現代都會生活中的重複性，則反映於和例行公事相關的生活習慣、路線規劃，以及休閒娛樂等。就列氏現代日常生活異化的觀點而言，現代生活中的重複特質，使得日常生活反覆建構於一個符合現代社會體制與生產關係的條件之中（2005:14）。在日常生活更貼近社會生產結構的同時，自我認同亦從中建立，成為維持生產關係的重要環節之一。小說中將此反覆且單調的生活習慣，同時展現於中產階級與底層人民的身上。如亞迪嘉描述，身為商人的阿薩克因為商業往來的需要，例行性地驅車遊走在德里市區內，停留的地點則不離銀行、辦公大樓或行政機構。除了工作地點之外，阿薩克與妻子休閒的去處則離不開大型商場、購物中心、電影院或是「康諾特廣場中心」¹⁵等場所。阿薩克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人物，日常生活的習慣符合現代都會生活的形態，其休閒活動與消費行為的連結，更凸顯了都市生活中，生產與再生產的循環關係。

除了描述中產階級的現代生活異化之外，亞迪嘉也檢視湧入德里的底層人民的生活經驗，就他的描述，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在資本主義的形塑建構之下有所變異，如同列氏所提出的異化概念。無可避免，小說中生活於德里的底層人民，透過其都會生活的實踐，重新進入生產與再生產以及支配與屈服的社會關係。一如書中主角巴蘭一般，底層人民為了能在現有的社會體制中謀生，不得不離開故鄉進入德里展開新的生活。作者所安排的主角身分極富象徵意義，原因在於，原屬社會底層的巴蘭，卻因為司機的身分得以經由例行性的往返於城市之中，逐漸融入現代都會生活模式，成為社會結構生產關係之下的工具。並且，在都會生活的反覆性建構之下，重新形塑對於都市與自身的認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底層人民看似為社會結構中的一份子，卻又像局外人一般，處處受到排斥與限制，在進行生產的同時，卻無法真正進入與消費活動之間的循環關係。小說中的巴蘭即是在德里這座大都會中經驗了此種有條件的現代生活，在無法滿足於都市生活中自我認同價值的同時，進入了一種衝突與矛盾的狀態。由巴蘭的例子可得知，一方面底層人民在現代社會的體制下受到約制，進入為社會關係所建構的生活形態；另一方面，底層人民於生活中所面臨的排斥與衝突，使得的自我認同無法從中建立。顯然，作者筆下的巴蘭在接受社會價值觀形塑的同時，在不能自我滿足與建立自我認同的情形下，轉而認同中產階級的生活模式，認為只有晉身於光明的世界，才是真正符合都市生活的價值。

¹⁵ 康諾特廣場中心（Connaught Place）位於新德里的北邊，是新德里的中央地標區域。廣場周圍林立銀行、飯店、電影院、餐廳以及各式店家。

結語

小說《白老虎》中，亞迪嘉以叢林的意象作為暗喻，不僅以此展現德里混雜的城市地景，同時亦藉此暗指印度社會於現代都市化進程的變動之中，所衍生的權力衝突、階級對立，以及因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認同矛盾，還有生命價值與道德敗壞等問題。作者以光明和黑暗之間的拉扯，表徵社會階層彼此之間的角力與權力的消長。藉由描述衝突之下的失序狀態，表達城市想像建構的混雜性，以及認同形塑的流動性和不完整性。在亞迪嘉的筆下，混亂的城市空間中，都會生活的建構，猶如反覆堆疊的碎片，顯得支離破碎，看似一體卻又各自分離。除此之外，作者將德里的都會生活比擬為原野的叢林生活，藉此暗指社會體制的崩壞，嘲諷資本主義社會機制建立於不擇手段、相互爭奪的利益追求之上。作者深刻道出，生活於叢林中的人們，為求名利晉身社會上層而你爭我奪，但是爭奪的結果，卻使自我更深陷叢林爭鬥之中，逐步踏入矛盾衝突且漸漸疏離人性。藉由故事中巴蘭的人生際遇，作者嘲諷當今印度社會中自比為白老虎的人們，忙於附和現代都市生活價值、追求名利爭長競短。作者也以書中白老虎的際遇，感嘆人們為求私欲迎合體制權勢，不惜犧牲一切，人性喪失，身陷叢林泥沼之中卻沾沾自喜，無法自拔。

引用書目

- Adiga, Aravind. (2008), *The White Tig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 Althusser, Louis.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27-86.
- Banerjee, Biswajit. (1986),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and the Urban Labour Market: A Case Study of Delhi*. Bombay: Himalaya Publishing House.
- Bult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hand, Sarvar V. Sherry. (1994), "Caste,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in Contemporary India."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5.1: 25-33.
- Dalrymple, William. (2006), *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85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umont, Louis. (1980),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efebvre, Henri. (2009), "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Ed.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10-222.
- Lefebvre, Henri. (2005),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3*.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Lefebvre, Henri. (2002),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Lefebvre, Henri.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 Sandhu, Ranvinder Singh, ed. (2003), *Urbaniz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Soja, Edward. (1996), *Thirdspace: Journey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